

## 自序

这本书是我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初稿2008年底完成，2009年中修改过。本次出版，便于阅读理解，正文中引用的古文基本上都译成了白话文。为了保持原书稿一些预见性的阐述，其他没有作较大修改。

我本来是理工科的，却要下决心，工作之余，读通中西文明那些晦涩难懂的经典名著，深入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西方历史，仔细观察、思考西方民主政治运作的实质，理出其优势和缺陷，并从中华文明中找出改进、提升、超越的新路。

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干劲，这么久的韧劲，自发、无偿地做这件事呢？为了争口气吧。

政治文明是世俗文明的核心。中华政治文明的复兴不仅关系到世界的长久和平与繁荣，更关系到整个华人世界，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荣誉。为了这份荣誉，我坐冷板凳努力几十年了，终于快到这一天了！

第一，美式民主每况愈下。特别是在今天这大众传媒时代，政治人物需要大量金钱搞竞选，先把自己变成了财团的傀儡。然后，为了赢得竞选，不择手段，互相攻击，互相抹黑，无所不用其极。2016年总统大选更使美国人自己，以及整个西方社会感到错愕。这样的民主竞选，老百姓手里的选票不仅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还得忍受由此而来，社会严重撕裂的痛苦。

台湾的民主实践，政党互相倾轧，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党轮替了，结果是什么呢？在这政治党派之间互相诋毁，互相拆台，自毁式的制度化恶性内斗中，政党的头们轮流坐庄了，风光了，创造历史了。老百姓呢，得到多少好处了？“苦”字当选2016年台湾年度代表字，历史性的政党轮替给老百姓带来什么，不也一目了然吗？

我经常回大陆，也经常和出租车司机，农村、街边小老百姓聊天。大陆下层老百姓看怕了台湾的民主。我问他们，要不要像台湾一样选国家领导人，没几个说好的。我再问他们，要是领导人还是由上面选，做得好不好由老百姓说了算，这样好不好？他们都说这样好。

事实上，一些诚实的美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调查，多数大众忙于自己的生活、生计，对政治既不关心也一窍不通。四年一次最重要的总统大选投票率也一直很低，一百多年的记录显示，只有一半左右的选民在投票。那些投了票的，多数也是跟风者。跟谁的风呢？跟政治人物、宗教领袖、工会头目，甚至是电影、流行歌曲、体育明星等社会名流的风。竞选季节到来，候选人不遗余力的寻求那些社会名流的支持，求取粉丝们的大批选票。左右选民投票的，还有依靠大把金钱，铺天盖地，抹黑对手的竞选广告。所以，多数选票，根本不是选民深思熟虑的选择。另外一半左右不去投票的选民，就成了沉默的多数，他们的民意 in 普选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相反，领导人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老百姓就有相当准确的发言权。所以，美国国会多年来两党制度化地恶斗，造成政府运作不畅，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对美国国会的支持率，多年来都低于20%。如果做得好不好由老百姓说了算，这样的国会早就改头换面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金钱操控、党派恶斗下的选举，老百姓是难以通过选票使政客们为自己做事的。尽管他们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但是，一旦当选，政客们不怕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讨好给他们提供竞选资金的财主们，以便继续得到献金赢得下次选举，或积累机会离任后赚大钱。这是美国社会近些年贫富悬殊急剧增加，导致民粹高涨的病根所在。

第二，自从1991年美国一超独大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多安宁，反而因为一超独大，颐指气使，横冲直撞，使世界越来越乱。美国人直接出兵或挑起内战，搞乱了中东，现在又把目标对准了亚洲。无论怎么掩饰，无论话语怎么冠冕堂皇，都蒙骗不了中国老百姓，美国人在亚洲挑拨离间，制造是非，唯恐亚洲不乱的本质。

美国人想火中取栗，以搞乱他人来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霸权地位，充分暴露了他们鼓吹的平等、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在大陆老百姓眼里越来越没有正当性了，鼓吹美式民主的人们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第三，习近平当政以来，打破了一党执政必然腐败的长期论断。一党执政也可以高效地反腐败，关键就是谁是国家最高领导核心。这和中华文明几千年前就明白的道理，要有一个好皇帝是一致的。西方民主，看起来很热闹，很复杂，其实，本质上也没差多少。所以，总统制的，选总统最关键；议会制的，看起来在选议员，实际上也是冲着首相来的。哪个党派有强有力的首相人选，胜算就大；相反，哪个首相做不好了，他的党派下次败选的机会就很高。只是在金钱控制下和多党恶斗中，西方式民选的总统或首相越来越没有为人民尽责的诚意和效率。

当然，中华文明过去几千年在父传子、子传孙的家天下体制下，好皇帝太难有了，也造成了兴衰存亡、朝代更替时有发生。

自从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限制、退休制度以来，延续了四千多年的家天下终于结束了，至少像目前一样，十年一次，“皇帝”也可以选了。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比西方更好的选法。中国现行体制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尽管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透明度，退而不休的老人干政，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是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选出来的人，都是经过实际工作岗位长期历练，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们在体制内也越来越有可观的基础，便于上任后推行执政理念。选的过程中，尽管高层可能少不了激烈竞争，但没有牵涉几亿人的劳民伤财，撕裂社会，合格的领导人也选出来了。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环：“选贤与能”，从上到下，基本上落实了。接下来，人民需要得到的是监督权，保证选出来的领导人确实是为广大人民做事，管理好国家，也就是要落实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环：“以民为本”。这也是本书的重点。

第四，习近平是个有雄心的领袖，他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画下浓重的一笔。他的班子很有谋略，很有担当，反腐败常态化的大局已定，2016年5月17号，他就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开始寻找社会科学理论的突破了。习近平差不多集结了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突破，应该就是他要找的东风了。他虽然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更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应该是过渡时期的策略吧。就像当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始的口号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等到市场经济成气候了，就不再提计划经济了。

第五，习近平要找的社会科学理论突破是什么？继承性，民族性，创新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就是说不能把现有的政治体制推倒重来，又能融通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精华的古为今用和放眼世界的博采众长，实用的新理论。集古今中外于一体，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书还没有。这本书是我几十年反复阅读中华历史文化，以及古希腊历史文化和西方近代历史文化，近距离冷静观察西方政治实际运作以后写出来的，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第六，本书中提出的新型民主制度，评议民主，要求由精英们在小范围内择优选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核心，以及关键少数领导人接受定期的民意监督，在眼前的中国，好像还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困惑逐渐转向明朗的变化。邓小平引领的经济改革也不例外。从1979年开始艰难起步，进进退退，到了1992年就基本上成型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经济变革，不到十五年时间，就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果，这表明，把握好时机和过程，自上而下，巨大的变革是可以顺序渐进地完成的。

这本书稿曾经于2009年从美国特快专递寄给中央领导人。书中强调的对各级当政一把手，特别是中央和省部级关键少数领导人的问责制度，现在正在党内建立并付诸实施。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内监督无禁区，设立对包括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关键少数的监督制度。党内问责、党内监督机制体制健全以后，接受以民意为基础的外部监督，只是一步之遥。也只有建立起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才能长期有效地执行；没有外部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将会因为中央领导人换届和时间推移而流于形式。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对人民负责，接受民意监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稳固的民意支持率才是最直接、最具体、最牢靠的执政合法性。

民意调查如何施行？长远来说，立法设立人民信得过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定期施行。施行的办法，随机抽样，可以信件通知依法履行义务，规定时间内网上或电话回应。我在美国收到过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就采取这种形式，保证了回应率和时效性。也应该允许社会各界有资质的机构，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然后像体育比赛评分一样，取平均值作为调查结果。以上两者可以相互对照，便于社会监督。

民意调查不会遗漏沉默的多数，比一人一票的西方普选民主更有代表性。民意调查还可以按贫富、年龄、性别、族类、地域等细分，各层次的人民都有大多数满意，这样的社会，应该就是相当和谐的社会了。

中华民族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建立从国家元首开始的选贤与能，以民为本，使国家最高领导人以上率下，带头接受人民问责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使几千年来积累的深厚文明转化成今天巨大的软实力，也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这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造就新一代名垂千古的历史巨人的旷世机会，能埋没很久吗？有远见、有雄心的政治家能因为什么不着边际的主义而错过，终身遗憾吗？

## 美国一超独大二十多年，结果为什么这么糟？

美国一超独大二十多年，结果这么糟，这与他们有严重缺陷的历史文化有关。在宗教以外的文化，西方文化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古希腊哲人，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有些西方学者把他们自己称为亚里斯多德的个人主义者。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到了近代，被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被吹捧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亚里斯多德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到了残酷的极点，把人类当作动物世界，美化弱肉强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消磨以后，西方人有所悔

过，但主要在西欧。在美国，“看不见的手”和“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根深蒂固，只是在不同时期，以不一样的面目，不一样的程度出现而已。

在今天这个多极化，网络联接的透明世界，各国有了更多的选择，西方人那些以力压人，弱肉强食的文化越来越行不通了，至少是他们想维持世界领袖地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书中第一部分希望说明的。

有人可能会说，古希腊的历史还在左右着今天西方人的行为？太遥远了吧。果真遥远吗？且不说古希腊历史文化如何影响美国的立宪建国，就看看今天美国一些有广泛影响的人物拿什么来形容，拿什么来预测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就知道了：修昔底德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等等，出自何处呢？不就来自古希腊吗？所以，很多历史，无论有多遥远，还是回荡在今人的脑海里，体现在今人的行动中。

古希腊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我在完成这本书稿后，全面而深入地仔细研读了，看清楚了：是一部海盗和殖民者的历史。事实上，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修昔底德在他书中的第一卷，追述那场战争之前的古希腊历史时，就相当详细地说明了，那时的希腊一直流行着海盗和殖民的传统，很多人以成功的海盗生涯，获取大量财富、奴隶、土地为自豪。西方人最崇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一书开首第一卷中，也反复论证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把周边那些所谓的野蛮人当奴隶的奴隶制度是自然的，因而是正义的。并且进一步表明了奴隶与家畜没有什么差别，两者都用它们身体的功能，满足主人的生活所需。用战争去征服和取得野蛮人作奴隶，与用打猎去取得野生动物，有一样的自然与正义性，强调古希腊人应该不断地为此而磨练战争技能。

杀死人家，抢了财富，把活着的抓来当奴隶，还要指责人家是野蛮人，把自己标榜成文明人，西方人最崇拜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确实够伟大的！

过去几百年，当西方人先发达了以后，不是帮助其他族群共同繁荣，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几乎所有其他族群烧杀抢掠，殖民奴役，甚至种族灭绝。杀了人，抢了财富、土地，长期殖民奴役当地人，还被描绘成是“白人的负担”，是白人把有色人种带进了文明。美国人一边

吹嘘人人生而平等立宪建国，一边却畜养大批奴隶。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把有色人种当作人，只是选举需要数人头，才打折扣计数，还写入了他们如此引以为傲，象征平等、自由、民主、人权而戴上神圣光环的联邦宪法。这些不都与他们崇拜的古希腊历史一脉相承吗？书中第一部分对这些作了不少分析、阐述。

就是今天，那些黑影还在。搞乱了中东，是因为要送去民主、自由、人权；挑起内战，使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收留了一部分难民，却成了西方人的人道主义救援。二战以后，打残了的欧洲列强再也无力控制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西方人的宗主国心态却通过联邦、联盟，扶植代理人，等等，紧密控制多数独立建国原殖民地的外交内政，把自己从原来的殖民掠夺者，化装成恩人，抹杀、篡改残酷的殖民历史，竟然还能得到很多独立建国后的民众大面积地认同支持，西方人长期苦心经营的花招确实不简单。

好在今天的世界各方力量没有那么悬殊了，网络连接的世界也透明了，各国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终于有像菲律宾新总统那样，开始要求得到尊重，推行独立于原宗主国的外交内政。西方人的老一套不仅不再使他们占便宜，反而越这么折腾越吃大亏。美国人梦寐以求，妄想通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让世界“震呆”（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给那两场战争起的代号），结果恰恰相反，震呆的是他们自己。对两个贫穷小国的两场战争，持续了十几年，数千人战场丧命，数万人残体断臂，数十万人精神打击，战争和后遗症耗资数万亿美元之巨。美国人得到什么？一超独大的地位江河日下。

想当初，美国人在阿富汗赶走塔利班以后，众多国家愿意一起帮助阿富汗重建，美国人带好这个头，那怕再用这数万亿美元之巨的十分之一，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过上稳定发展的生活，还能不赢得几代阿富汗人感激涕零？还能不使全世界对美国这个老大心服口服？可惜，迷信武力的西方人，没有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人的历史文化基因。

就像一个人有了财富或权力，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有了道德；一个国家也一样，这个国家发达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有了文明。一个人有了财富或权力，首先要看这个人的财富或权力是怎么得到的，然后看

这个人怎么运用财富或权力。人的道德怎么体现？待人处事。有了财富或权力，不欺负人，尽心尽责地帮助他人，才能称得上道德。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财富或权力欺负他人，不是卑鄙小人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发达了，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怎么发达的，发达了以后怎么对待其他国家。国家的文明怎么体现？怎么对待其他国家。诚心诚意地提携其他国家共同繁荣，才能称得上文明。弱肉强食，以力欺人，无论怎么发达，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

现在再从历史源头看看，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不是来自于很多人常常认为，或者西方人自己吹嘘的西方文化和宗教，更不是基督教。古希腊民主时期，基督教还没有出现。今天西方民主得以发展运行，更是政教分离的结果，就是说，把基督教赶出了政治生活，西方民主才得以生根。其实，西方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方面，由于西方文明比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晚得多，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他们因祸得福，重新捡到了两次从原始村落政治开始，从头建立国家政权的机会，才最终结束了由国王和贵族把持的政治，进入以美国为代表的代议制选举民主制度。

当古埃及文明早就结束部落政治，君主制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古希腊还是小部落各自为政。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的君主制，由于海上商业往来，传到了克里特岛。几百年以后，再扩展到古希腊半岛。公元前1100年左右，古希腊的几个本来根基不深的君主制国家全部被毁灭，人口大减，政治结构又回到各自为政的原始村落。到了只有几十人，几百人的村落政权，原始民主又重新出现了。这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因祸得福。

等到人口重新增加，须要再形成国家的时候，过去君主专制的压迫，还留在代代相传的记忆中，人们不再要有君主专制的大国家。所以，公元前六、七百年的古希腊，在原来由十来个君主统治的地盘上，形成了几百个城邦小国，很多只由几个村落组成，最大的雅典城邦国的疆土也只有中国东部沿海的两个县那么大。这些城邦小国的政治结构，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些由各村村长等衍生出



来的贵族或者贵族集团把持。有一些政治结构，就是有民众参与的所谓民主政治。由于很多城邦小国各自为政，不容易抵御强敌，后来被来自于北方马其顿，君主制国家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来者征服，民主又消失了。

北美早期殖民地是个政治实验场，出现过多种政体。在那些由贵族，或者英国国王控制的殖民区，套用了欧洲本土的政治结构，少有民主。民主发源于由平民控制的新英格兰殖民区。最早的新英格兰殖民区是由逃避英国国王控制的基督教的压迫，乘坐五月花船到达北美的新教徒和一些冒险的农民组成。到达的时候有一百多个，过了一个冬天，只剩下五十几个。五十几个男女老少平民，组成一个原始村落，大家都命悬一线，不民主不可能。所以，民主又出现了。这是西方人第二次因祸得福。

后来，人多起来，需要组成殖民区政府的时候，新英格兰的平民们处处设防，既不要国王，也不要贵族，他们选择了代议制民主，政府主要官员由有财产的自由民代表选举产生。美国的民主就这样，由原始村落扩大发展起来的。后来，英国王权不高兴了，加强对北美，特别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控制，把民主的主要部分给没收了。各殖民区最多只保留民选的议会，殖民区的主要官员由国王任命。国王任命的殖民区主要官员与民选的议会斗了七、八十年，羽翼渐丰的当地势力，终于忍无可忍，十三个殖民区联合起来，推举华盛顿为领袖闹革命，摆脱了英国国王和贵族的控制，才通过立宪，确定联邦两院制的代议制民主。

西方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进步，它结束了世袭的王权和贵族制度。但是，这一进步，又因金钱操控、多党恶斗而大打折扣。由全国老百姓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民主先天不足，导致了结党营私、金权政治，互相攻击，族群对峙。虽然结束了王权和贵族，金钱控制下的政客们领导的政府，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仍然蜕变成劫贫济富的工具，催生了没有底线地贪婪，在全世界攫取财富的资本、金融大鳄。书中第一部分对美式民主的历史和弊端，做了大量分析和阐述。

## 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别有多大？先看看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在中华文明中生活了几十年，上至达官贵人都有广泛交往的著名西方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比较：“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终极控制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sup>1</sup>

今天看这四百多年前的描述，是不是还活灵活现，只需要给欧洲人加上或换成从那儿衍生出来的美国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几千年领先世界的巨型国家少有侵略的历史？答案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明中。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大的特点是提倡以德治国，这一条主线到今天还没有断，这也是我们的文明能够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不间断地延续至今的根本。

可惜的是，什么是以德治国，能说清楚的人很少了。在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被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坏皇帝和御用文人们扭曲、异化，还有最近一百多年的丑化，到今天，人们已经把以德治国等同于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了。

历史上推崇以德治国，影响最广最深的应该是孔子。孔子的思想是从他以前的历史文化总结出来的，所以，什么是以德治国，还得从孔子之前，尧、舜、夏、商、西周等中华历史源头去找。我花了好多年时间，慢慢把《尚书》、《周礼》、《管子》、《左传》等经典古籍读通了，觉得豁然开朗。这些经典古籍所体现的以德治国，与今天人们的认

---

<sup>1</sup>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

知大相径庭。以德治国在法治之上，是法治的保障，就是说，只有德治，才能有真正的法治。书中第二部分有大量的分析和阐述。

以德治国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对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际关系。在古时候，就是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提倡以德治国的华夏，与西方世界大相径庭。

华夏自古以来就没有以自己的强势去奴役他人，至多以自己的优势文明影响他人。他人不接受，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去强迫，而是想办法使自己做得更好来吸引他人。这就是孔子总结出来的：“远方的人不服，就勤修文德吸引他们来；来了，就让他们安心。”<sup>2</sup>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就很好地重现了这一精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以高铁为标志的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当今中国对很多国家已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欢迎大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外交部也一再明确表示，参加“一带一路”基于自愿。愿意参加的，不拉下一个；不愿意参加的，也不硬拽一个。这就是中华文明对外关系上体现出来的巨大软实力：我们发展了，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仗势欺人、巧取豪夺，而是以他人接受的方式，诚心诚意地提携其他国家互利双赢、共同繁荣。

当然，“一带一路”是长期战略，不能操之过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只有内政搞好了，外交才能成功。做好13亿人的内政，建设好这个比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全部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国内市场，大幅度提高已经具有相当消费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对世界最大的吸引力，是“一带一路”战略长久不衰最稳固的基石。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管仲2600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明：“国内事情不做好，对外事务不会成功。”<sup>3</sup>管仲还有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深刻的警戒：“不是人家想要的，不要强加于人，这是仁德。”<sup>4</sup>

---

<sup>2</sup>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sup>3</sup> 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管子·大匡》

<sup>4</sup> 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

对外方面，就是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基本上还在延续。所以，汉武帝驱逐匈奴有功，但后来穷兵黩武使民不聊生；隋炀帝连年征伐，导致皇朝灭亡，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诟病。然而，宋朝以来，一些空谈仁义的文人，自废武功，使泱泱大国不能自保，也不是中华民族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愿意看到的。中华民族不以强凌弱地处理对外关系，也是今天世界的大趋势，只有这样，小国才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大国的引领。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越耀武扬威，国际地位越直线下降。

当然，这不是说中华民族不要强化武力，特别是在美国人等咄咄逼人的情势下，自身的武力一定要加强。有了自身足够的武力，不以强凌弱也必须让世界明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武力是用来吓阻横行霸道者，使自身立于不被侵扰之地，而不是用来欺负弱小。这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承诺永不称霸的历史文化基础。

对内，以德治国，概括地说，可以用两句话八个字表达：“选贤与能，以民为本。”首先，对治国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还有系统而缜密的法律制度，最终的目的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孔子之前一千多年以德治国的历史，最原始的记录，在《尚书》、《周礼》等古籍里。我深入地分析了这些古籍，在书中第二部分里作了很多阐述。

《尚书》记录了从尧、舜、夏、商、西周，到春秋秦穆公时期，大约一千五百年，中华民族最高领导层处理国政的一些对话、文诰、训诫，以及商、周朝代轮替等，是一部了解当时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以及朝代轮替的深层因素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周礼》原名《周官》，其实是一部西周中央政府的政府手册（美国联邦政府1950年代开始才有联邦政府手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西周中央政府六大部门的机构、编制、职责，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里边提及了大量的法律规章，对官员有严格的考核问责制度。（那就是为什么，汉朝《周礼》重新面世以后，受到历代大量官僚的反对，被斥为伪书。那些整天想着如何做官当老爷，封妻荫子的官宦们，谁会喜欢被考核问责呢？）

《周礼》表明了，以德治国是建立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之上的，当时的司法审判也有很高的独立性。

为什么只有德治，才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有好有坏。美国人自称是法治国家，世界上多数人也这么认为，那就以美国为例吧。美国的法能坏到什么程度？举几个例子吧：依法建立了二百多年之久的奴隶制，实施六十多年之久的《排华法案》，等等。这种奴隶制还得到了让全世界佩服地五体投地的联邦宪法的认可。后来需要好几年的全面内战，还有好几个宪法修正案，才结束了这种法治！《排华法案》则是到了二战时期，美国需要中国作盟友才废除。这样的法治好吗？

坏的法能是德吗？绝对不是！只有好的法才能称得上是德，好的法需要有德的当政者才能建立，才能得到忠实地执行。相反，要是当政者没有德，不仅好的法很难建立，就是已经有了好的法，也难以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干脆像美国在里根以来的共和党及其一些民主党的当权者一样，以放松政府管制为名，把从大萧条和二战那些血淋淋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后所建立的，几十年行之有效的联邦法律不断废除，导致了贫富悬殊急剧增加，甚至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得不到恢复。此外，长期以来，美国监狱人满为患，按人口比例计算，在押犯是世界平均值的五倍。这样的法治值得自豪吗？

所以，德治不仅在法治之上，更是法治的保障。只有德治，才能达到真正的法治，也就是依公正的法而治。

当然，西周时期，由于当时是家天下，碰上坏的继位天子，公正的法也很难施行，才有西周消亡，东周开始。自此以后，以德治国的传统，经过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的破坏，特别是秦王朝强力重新统一全国，继续大规模地奴役自己的人民以后，越来越有名无实了。令人惊奇的是，秦王朝以后的两千多年，竟然还有像汉文帝、唐太宗那样少数几个，基本上做到了以德治国的皇帝。书中对这两个时代也作了不少分析。

经过全面分析以德治国的内涵以后，商鞅之流提倡的法治的实质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所谓法治，基本上是刑罚之治，把人民当作统治、奴役的对象，当权者高高在上，一手拿萝卜，一手拿大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统治。书中从商鞅变法的历史

和《商君书》出发，对商鞅式的法治也作了不少辨析。当然，这不是说以德治国不需要刑罚，而是使刑罚处与不得已的辅助地位。

从先秦的历史来看，以德治国是全面而公正的法治，治官严、治民宽，从国家元首到各级官员，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引导人民安居乐业的法治。这与习近平当政以来，努力从自身开始做起，督促中央、省部级等关键少数的领导人，以上率下，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相当一致？

为什么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文明反而更具现代性？当今世界有大量的文献表明，人类社会在小部落文明时期很多是民主的。我在浙江农村长大，1978年上大学之前一直边读书边干农活。就是在文革时期的高压政治下，我们自然村里约四百口男女老少，大约一百多男性劳力，有时候是一个生产队，有时候分成两个，最多时分成三个，我们每年无记名投票提名，推选生产队长。互相知根知底，小范围的提名推选，不需要竞选，提名推选没有预设的候选人，选完后不存在谁赢谁输，不会撕裂邻里关系。生产队的决策也非常民主。我们的生产大队有三个自然村，生产大队就有共产党的党支部，有大队长，他们是上边任命的，老百姓就不能推选了，也没有监督权。

以上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在很古的时候，也是小部落的时候，很可能也是民主的社会。直接民主的局限是国家难以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四、五千年前，已经突破了小部落的界限，形成横跨黄河长江的大联合。文献记载，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当时以部落为基础的国还很小。到商朝的时候，有国三千，部落变大了，国的数量变少了。西周分封诸侯八百，国更大了。这些数字应该是约数，但其所反映的国从小变大，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国大了直接民主就难以实现了，但是，夏、商、西周还保存着不少民主的遗风，基层（村等）还是有民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周礼》有不少记录。国一级，民主经常以征询民意实现，《尚书》、《左传》还有《周礼》、《国语》等古籍都有些记录。

夏、商、西周时期，人民的力量大，为什么？其一，因为当时都没有用于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正规军。那些时期，实施的是寓兵于民政政策，军事力量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当时，每年春夏秋冬农闲的时候，有国家组织的大型狩猎，也是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用民兵来欺压自己的老百姓，就没有用吃皇粮的正规军那么灵了。其二，当时的天子没有秦朝以来的皇帝那么大的绝对权力。夏、商、西周是分封制，天子有册封或惩罚诸侯的权力，但没有随意撤换诸侯的能力。好的诸侯在自己的国度里有很深的民意基础，也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合理合法地自保。天子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撤换诸侯，不仅难以召唤其他诸侯国相助，也会受到当事诸侯国人民组成的军事力量奋力抵抗。所以，夏、商、西周时期，推崇天子以德服人，以法统御诸侯，德治得到强调，法制比较健全，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所致。

西周时期数以百计的诸侯国，经历五百多年春秋战国的兼并，只剩下战国七雄。再经过秦始皇吞并六国，重新统一全中国，废除分封制，建立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这几百年的过程，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集一统中国的大权于一身。在中央集权制下，就是统御一方的封疆大吏，或任命，或免除，也只需要皇帝一道旨意。任何封疆大吏妄想拥兵自重，就是大逆不道，法定的死罪。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皇帝经常独断专行，不能践行德治、遵守法制。所以，秦汉以来，德治、法制每况愈下。

以德治国很好，但是，过去实现的机会这么少，这是为什么？其一，国家权力的家天下和终身制。家天下使最重要的国家元首，不能选贤与能。终身制使像创造盛唐大治达三十年之久的唐玄宗那么英明的雄主，到了老年，倒在杨贵妃怀抱，自毁成荒淫无道的昏君。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到了老年，不也给中国人民带来十年浩劫，把自己自毁成历史罪人吗？其二，人民没有充足的渠道，参与监督上达国家元首的各级主要当政者。所以，今天的中华民族，在邓小平建立领导干部任期限制、退休制度，基本上落实了从国家元首开始选贤与能以后，还需要纵观中华古为今用，横览世界博采众长，建立人民参与的监督、问责机制，创新政治制度。

中华文明被自毁性地破坏很久了，最近一百多年最令人痛心。然而，这种自毁性破坏的历史，却要比一百年长得多。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今古文《尚书》之争了，各派都想把对手挤出去。实际上，他们的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权位、利益之争。以文化垄断争权位、利益，就是自毁性的破坏。中华文明需要恢复、更新，首先得分清楚什么需要恢复，什么需要更新。另外还得牢记古训：“欲速则不达。”社会变革最好是渐进，而不是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经受了太多苦难。那些热血青年们，从康有为、胡适之流，再到那些自称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拥有者，尽管热情可嘉，都是生搬硬套他人的东西，欲速则不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少灾难。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四、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大国、大民族、大文明，他的子孙应该那么低能，盲目到处照抄，甚至盲目认他人作祖宗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能够从自身的文明历史出发，找到政治制度创新的思想源泉，是很振奋人心的。这一百多年来，很少人认为中华文明与现代民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被西方学者的一些似是实非的谬论和西方民主的表象迷惑了。我仔细分析了西方民主的运作实质，以及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民主从来就不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也还是精英管理国家。美国的民主，同样有从住戒备森严的白宫，坐威风凛凛空军一号出行的总统，到部长、州长、市长和平民百姓等等的尊卑等级。民主只是给大众提供路径对精英管理国家实施一定的监督，使精英们不得自我吹嘘，恣意妄为，不得不认真为大众做些有益的事。西方民主以选举的形式来实施监督，很多时候，把自我吹嘘，胡说八道的假精英选上去了，过几年才能把他们选下来，代价也不小，当然，比暴力革命的代价小多了。

明白了民主也还是精英管理国家，同样有尊卑等级，很重要。这样，民主就与中华文明历来强调的选贤与能挂上钩了，我们自己的文明历史就不是包袱，而是积累了几千年的深厚资源了。现今，从上到下选贤与能基本上解决了，剩下来的就是如何监督精英的问题。西方民主的选举为监督提供了一种方式，毛病很多。从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前强调的敬畏民意出发，用现代方法作些改进，综合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有用成



分，就能找到对西方民主有超越性的政治制度创新。书中第七章集中阐述了基于中华文明的评议民主如何建立，如何与中国现行体制过度对接，如何超越西方选举民主的方方面面。

中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大变革时期，三十多年和平、快速地发展证明我们这个文明型大国和平崛起是现实可行的。世界需要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德治传统的文明型大国内政外交全面崛起，扭转源于海盗和殖民历史的掠夺性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在今天这个全球村时代，仍然四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火中取粟，更不惜鼓动如簧巧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颠倒是非抹黑他人，以此寻求维持高人一等的西方霸权格局；推动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未来的世界比今天更美好。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 争口气的心路历程

我生长在农村，家里世代农民，母亲十几岁就父母双亡，还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生活很艰辛，这也练就了她坚强勤劳的性格。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她始终没有忘记，人活着要争口气，从小就经常这么对我说的。

父亲宽洪大度，也没有机会读书。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要上街卖自家农产品，经常带着我帮着算账。每每听到顾客夸奖：“这小人真聪明，算账随口出！”父亲没说什么，心里是很高兴的，他对我的慈爱也是默默的。

我小的时候，母亲没有想到，农民家的儿子也能读书争口气。当然，母亲更不会想到我会卯足劲争那么大一口气，不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争口气，进而为全世界普通人，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普通人争口气。当然，这一口气能否争到，还取决于中国有没有政治家有勇气突破意识形态迷途，一扫百多年使中华五千年文明蒙盖的雾霾，复兴自身文明，开创世界民主新纪元。

我五岁的有一天，看到有小朋友上学，就说我也想读书。比我大九岁，背着我长大的大姐，自己没有上学的机会，因为需要帮着母亲做家

务，需要绣花挣钱补贴家用，听到我说想读书，就带着我去报名。五十多年过去了，报名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学校开始不同意，说我太小。大姐软磨硬泡，也说了善意的谎话，给我多报了一岁，当时的农村没有户口本，也没人查证。可是，就是多报了一岁，还是比规定年龄差了一岁。幸好当时上学的小孩并不多，学校允许我上学试试看，如果跟不上，就让我退学回家。我跟上了，还学得挺好。

从此，我和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了初中以后，能阅读不少书了，可是，就是找不到书。那时是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乡村里难得的藏书，大部分被烧掉了。少数没烧掉的，主人也深藏不露，不敢随便借人。我只要听说附近村里，某家有藏书，就想方设法去借。借回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不少读了好多遍。

炎热的夏天，白天地里干农活，辛苦劳作；晚上，同龄小孩成群结队，村里东头西头地跑，一边纳凉，一边嬉戏。听见他们嬉戏打闹声，我也好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不过，还是书里的故事对我更有吸引力。那时候的乡村还没有电灯，煤油灯下，我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书。这也使我养成了，耐得了寂寞，一个人安静看书的习惯。

有时候，我看书太入神了，母亲扫地扫到我跟前，我还没有起来让她打扫我坐的地方。母亲生气了，把扫把倒过来，用那竹棍就敲打我的腿，我赶紧起来让地方。因为读书，也经常忘了母亲交代我要做的事，挨了不少骂，挨了不少打。后来我考上大学，出国留学，母亲一直为小时候因为读书打骂我很内疚，我也一直宽慰她。母亲还是难以释怀。有一次，不识字的母亲，让我大哥写了一封挺长的信，漂洋过海地寄到了美国，向亲儿子道歉。我打开信看了后，眼泪刷刷地流下了，我为母亲难以释怀而焦虑，也为母亲的博大而自豪。有了遗憾，有过错失，对自己的亲儿子也真诚道歉，这样的母亲才能称得上伟大吧！

文革中，我的学业中断了好几次。小学毕业没初中，初中毕业又没高中。回家种地一年多后，才上了高中。上了高中，可以向同学借书了。借到了唐诗宋词，爱不释手，读了好多遍，干脆手抄了好几本。南宋陆游的“千年史册耻无名”，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得经常光着脚，每天走好几公里路，到城里去读书了。乡下孩子进城读书很被城里的老师和同学瞧不起，我就暗暗下决心，学习成绩超过城里人，争回这口气。所以，我的学业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中学时代也赢得了好几个城里同学的信任。

1976年5月16日，我们学校门前的大操场举行万人集会庆祝文革十周年。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临近高中毕业，继续读书无望，冒着杀身之祸偷偷地议论着：文革除了老毛保住了他的宝座，好处在哪？！

一个多月后，高中毕业了，我又回家种地了，对自己的前路，越来越感到迷惘。九月份的一天，我正在给菜苗浇水，租住在村里的一位工厂技术员走到河边，对我们说：“毛主席逝世了。”他站着聊了一会，临走时补了一句：“该干嘛的还是干嘛，拿榔头的还是拿榔头，抗锄把的还是抗锄把。”

听了这消息，我心里兴奋，不敢溢于言表。我当时就想，我不会一辈子抗锄把了。果然，邓小平复出以后，很快就恢复大学招生考试。我一边务农，一边准备，找不着复习资料，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没考上。后来，我毛遂自荐，去了当时进驻村里，揭批四人帮遗毒的工作组，不用干农活了。有了些复习时间，再向城里的几个要好同学借了些复习资料，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可惜的是，我几个要好同学都没考上。

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只够上外省的一些重点大学。我就鼓起勇气走远一点，填了去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志愿，竟然如愿以偿。

1978年考上广州华南工学院轻化工系。工科成绩优异，同时自学了量子化学等理科课程，并以自学的理科课程，于1982年考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教育部公派留学预备生，经一年法语培训，于1983年7月赴法国留学。当时，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两名出国预备生，另一名称体检不合格，我们两人的专业被弄错了，他的催化化学成了我的专业，我被派到位于法国里昂的国家催化研究中心攻读学位。1987年9月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1990年到美国，1994年就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毕业后曾在两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

1983年，初到西方社会，那种震撼，终身难忘。文革时期，在我们正趋成熟的心灵中灌输的，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远大理想，这一下全看清楚了，急待解放的就是我们自己。从此，我开始了一边为生计学工，一边为争口气学文。1987年9月得到法国化学博士学位，就回国了。当时，我只想着，留法期间，虽然寒酸，也至少每年消耗了几十位乡亲父老的劳动成果，博士学位拿到了，没有联系好工作单位就回来了。

回来又吃了一惊，一方面，得到的是人们诧异的眼光和惊讶的疑问：“你怎么回来了？”问得我一脸茫然。后来才明白，当时人们的感受是，国外这么好，为什么回来？肯定是没本事呆不下去。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多有妒嫉之心，怕来个年轻的洋博士，把一些人好不容易得到的职位年轻化、知识化掉了。幸好在李政道博士的敦促下，中国刚刚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好有个位子空着，就回到大连做博士后了。后来又遇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灰心了，又找机会回到了法国。

1990年5月辗转来到美国。来到美国辛苦了多年，1996年3月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拿到金融MBA，才在跨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1996年元旦期间，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浙江老家探亲，带回来一些古书。又开始了一边为生计上班，一边为争口气学文，从此对中华民族先秦文明有了经久不衰的兴趣。以西方近代文明来自于对古希腊文明的复兴为线索，致力于在中华民族先秦文明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思想源泉。

进了跨国公司，虽然受限制，本人职位不高，幸好我涉猎广泛，做的事、讲的话，还能用得着，有机会为与公司最高层有关的一些项目出力，也看到了跨国公司高层权力斗争的黑暗。西方人并没比东方人高尚。在美国生活日久，加上对东、西方文化知识的日积月累，发现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多党竞争民主的不少弊病。思考良久，正逢中华民族处在大转型的时代，要是能东、西方文明，各取其优，中华民族不仅能民族复兴，还能跳出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框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大争一口气，全面超越西方人。这就是写这本书的目的。

## 致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生养了我，还从小培育了我勤劳、争口气的精神，使得我在不平坦的人生道途上，始终能够自信地直面现实、自强不息。

感谢勤快能干、节俭持家的妻子，两个聪明、自觉、勤学的儿子。兄弟两相差六岁，兄友弟恭，相处极好。这使得我省去很多家里的操心事，得以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专心致志地研读。

感谢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弟弟，他们的勤劳节俭协助我安心地读完四年大学。在我远涉重洋，长期不能回乡之时，他们照顾父母，养老送终，减轻了我的后顾之忧。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浙江老家，都是普通人，也遭受过不少社会不公。我写这本书，也希望能够创新政治制度，使像我兄弟姐妹那样的普通人，免于受政客们为了自己竞选上位，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之扰，平静地得到对政治人物问责的权利，有保障地安居乐业。

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在推动中华文明复兴中起到预想的作用，进而为人类文明超越西方的固步自封作出贡献，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兼东亚研究所主席，历史学家王赓武，不经意间成了我的伯乐。我曾经把书稿电子邮件附寄给王教授，希望他批评指教。他很快给我回复了，对我说，他正忙着准备出国，没时间阅读，把我的书稿转寄给他在出版社的几个朋友了，如果他们有兴趣出版，会与我联系。

几天以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和主编潘国驹教授就给我发了邮件，联系出版事宜。所以，这本书能与读者见面，感谢潘教授慧眼识珠。

这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华文部何华主任和冯婉明编辑的悉心安排。也感谢参与本书出版的其他工作人员。

陈方仁 2016年12月